

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 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

陈玉聃

摘要 在国际政治中，文学若非作为文化外交和软权力的工具，往往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国际政治研究者能否打破学科的藩篱，不仅站在政治的框架中审视文学，也借由文学之镜来透视国际政治？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国际政治之文学透视的理论框架。文学透视的研究对象，并非客观现实本身，而是通过作品所呈现的心对物（观念对现实政治）的映照；在此“心—物”关系的总括之下，本文以“虚—实”和“共—殊”两者为支点，从认知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文学透视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价值所在，并依此框架，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进行了解读，并对国际政治之文学透视的意义做出了哲学上的讨论。

关键词 国际政治 文学 莎士比亚 亨利五世 民族国家战争

文学与国际政治，看似两种绝难邂逅之物。文学属文艺之列，文艺向被认为是情之寄托，美之体现，而文学又是诸艺之中最为精粹者，可言志，可缘情，甚至是有无教化的标志。国际政治则自然属于政治领域，人们大多相信，政治活动诉诸理性，讲求现实，强调算计，充斥权谋，而国际政治又是现实政治之顶峰，与追求抒情、想象的文艺作品似乎相去甚远。固然，文学经典中不乏对于国际政治的描绘，但它们终究难得国际政治学者的青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研究中没有文学的一席之地。上世纪末以

* 陈玉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 笔者感谢张云雷、李隽旻、王子夔、何伟等老师和同学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来，随着学界视野逐渐向低级政治扩展，对文化的研究也逐步登堂入室，尤其是在公共外交的主题和软实力的概念兴起之后，文化研究更显繁荣，相应的，文学也屡被提及。只不过，在国际政治与文学的相遇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多是单向的。

一方面，相关的成果主要来自文学研究者对国际政治的介入，而非国际政治学者对文学的兼涉。例如，美国在冷战中的文化外交向来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最近一部关于文学的著作《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作者正是来自于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鲁宾。^①在国内学界，国际关系学院郭小聪教授新近付梓的《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一书堪称力作，郭先生虽横跨文学和国际政治两界，毕竟首先是一位出色的诗歌评论家；稍早前著有《文学国际政治学》一书的林精华教授，虽兼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其本职却是俄罗斯文学研究。^②相较之下，国际政治学者中虽不乏精通文墨者，却似乎对此少有兴趣做专门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文化”的大框架下蜻蜓点水地以文学为例，论及它对国家外交的些许贡献。^③

另一方面，文学——以及其他文艺形式——通常被当作变量和客体（甚至是工具），作为因果链中的一环，依附于文化外交和软实力等国际政治中固有的分析框架。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国家怎样利用文学为其服务，文学又怎样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这固然有利于我们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认识国际政治，但又只是将原有的视角——利益算计、权力斗争等——加以延伸，囊括文学这一曾经被忽视的领域。相反，学者们似乎很少为文学确立一种主体性的地位，通过它来反观国际政治，以一种诠释性的方法，促发对世界的探讨，丰富对政治的理解。通俗地说，在国际政治与文学的邂逅中，我们所见多是“国际政治中的文学”，而非“文学中的国际政治”。

简而言之，国际政治研究者能否打破学科的藩篱，不仅站在政治的框架中

^① Andrew N. Rubin, *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该书很快被译作中文，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反响：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此外，著名学者刘禾也曾做过类似的研究，而她同样来自于比较文学领域。此类作者通常持左派立场，将文学视作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另有一部著作近来在国内外也较有影响：彼得·芬恩、彼特拉·库维《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贾令仪、贾文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两位作者一是《华盛顿邮报》名记，一是外语教师和翻译家。

^② 郭小聪《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林精华《文学国际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 国际政治学者对此并非没有深入的思考。在莫言2012年获奖之后，一些学者曾在邮件群内就文学与国际政治的主题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其中张志洲、范勇鹏、宋念申等几位的观点尤为深刻，令笔者获益匪浅，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在这一领域仍极少看到相关的论文和课程。

审视文学，也借由文学之镜来透视国际政治，并以此在本体、认知、方法等诸方面反思学科的边界和理论的构建？

一、综述：既有研究的理路

确有一些学者做出了如此新颖的尝试，但要按照惯常的方法分门别类予以总结，似乎又殊为不易，因为这方面的论著虽数量有限，却各有进路，与著者原有的思想背景及理论关怀密不可分——事实上，其中一些学者在国际政治理论上本就有着相当的贡献，而对文学的研究又是其理论的延伸。为此，笔者试图撷取较为重要的作者和文献罗列于下，加以简要的评述，意在引读者一窥其境。

若在这一较为前沿的领域中探索，首先会遇到的一座里程碑便是《千禧年》杂志 2001 年第 3 期的专辑“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Images and Narratives in World Politics*）。此专辑包含多篇以艺文观政治的作品，作者中不乏布朗、夏皮罗、德·德里安、哈利迪、西尔维斯特等名家，内容涉及视觉艺术、影视、音乐等多个领域，以文学为主题的亦有多篇，展示了国际政治研究涉入文学的多种可能性。^① 它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汇集了兴趣相近的研究者彼此交流，更在于引发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拓展，有着承上启下之功。

在此期《千禧年》上，以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为例研究全球化与科幻作品“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英国学者韦尔德斯，不久之后即主编了一部论文集，更为系统地探讨科幻作品与世界政治的主题，也更加完备地将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理论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② 我们或可用较为通俗的“镜像”

^① Chris Brown,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tervention by a Liberal Utopia”,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3, 2001, pp. 625-633; Costas M. Constantinou, “Hippopolis/Cynopolis”, *Ibid.*, pp. 785-804; Fred Halliday, “High and Just Proceedings: Notes Towards an Anthology of the Cold War”, *Ibid.*, pp. 691-707; Louiza Odysseos, “Laughing Matters: Peace, Democ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omic Narrative”, *Ibid.*, pp. 709-732; Jutta Weldes, “Globalisation Is Science Fiction”, *Ibid.*, pp. 647-667.

^② Jutta Weldes, ed., *To Seek out New Worlds: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关于互文性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借鉴，亦可参见夏皮罗和德·德里安的经典著作：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mirror) 一词来表述“互文性”，^① 它并非是简单的比附，^② 而是借文学之镜映照国际政治中各种概念和实践的复杂内涵——或者不妨说，照出国际政治及其行为者的自然本性 (nature)，照出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③

在《千禧年》杂志和韦尔德斯的论文集中贡献了两篇讨论外交与《星际迷航》的纽曼，此后也进一步拓展了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讨论外交原则和实践的基础上，又不断对流行文化的本质和表现进行探究，逐渐构筑起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影视作品，^④ 但他在2006年与新锐学者内克松合编的论文集《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却是涉及文学主题的重要作品。客观而言，文集中各篇水准参差不齐，此书价值更多地在于两位编者执笔的前言，它为通俗文学乃至流行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归纳了四种研究路径，虽不免模糊粗糙，仍不失为这一领域入门的必读文献。^⑤

康斯坦丁努则以马和狗两种古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作为政治象征，探讨自我与他者、国家与全球、特殊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主题。几年之后，他撰写了《政治话语的国家：言词、政体、煽动》一书，^⑥ 将包括《千禧年》刊文在内的数篇论文修改收入，又增加多个章节，以“国家” (state) 一词之古希腊语词源 stasis 的复杂性^⑦为切入点，将哲、史、政、文、艺等多个透镜重合交叠，揭示为近代话语所遮蔽的国际政治的多种面相。该书以马基雅维里喜剧《曼陀罗花》起兴，又有半数篇章涉及文学，涵盖神话、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是一部深度与广度兼备的佳作。

① 事实上韦尔德斯这部论文集中的不少作者都用到了“镜像”这一概念。

② 国际政治学者在解释理论、解读现实时，常借用文学作品中的嘉言警句或者经典形象。鲁尔克的经典教材《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即属此例，每章开头均引用莎士比亚词句来说明主题。此种比附的方式在教学和普及上自有独到的价值，但它只是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知识提供注解，于研究作用不大，故未在本文讨论之列。鲁尔克此书有两个中译本，分别是罗尔克编《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鲁尔克《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白云真、雷建锋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英文原作几乎每年再版一次，笔者所知最新版本为：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12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③ 此处借用《哈姆雷特》第三幕中的经典比喻，莎翁原文有“the mirror up to nature”一语，恰与前述“镜像”一词相应。

④ 作为知名国际政治学者，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讲座教授的纽曼似乎对科幻作品尤为关注，2013年他还联合主编了《太空堡垒与国际关系》一书。Nicholas J. Kiersey and Iver B. Neumann, eds., *Battlestar Galact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⑤ Iver B. Neumann and Daniel H. Nexon, “Introduction: Harry Potter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Daniel H. Nexon and Iver B. Neumann, eds., *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23.

⑥ Costas M. Constantinou, *State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ords, Regimes, Sedi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4.

⑦ stasis 既有站立、状态、位置的含义，又有煽动、纷争、对立的意思。

西尔维斯特教授以对绘画和博物馆的研究闻名,在《千禧年》杂志专辑中也是借抽象派作品来反思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①但她对文学同样怀有非同一般的关注,且与对绘画的研究有着相通的旨趣:通过文艺的进路,从方法论的层面,揭示和挑战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方式,以此打通学科的界限,沟通理论与现实。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权威,西尔维斯特在其代表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未尽的旅程》的最后一章,提供了一种“文学的方法”,将国际关系学和女性主义视作两个“想象的共同体”,设计了一场双方学者的“世界旅行”,让他们彼此进入对方的国度。要理解陌生的领域和“他者”,最好的办法是坐下阅读,以摒弃“自我”的成见,而最佳的阅读材料则是小说这样的虚构性作品,因为它既是构筑边界的工具,又蕴含着不为我们所见的变化和可能性,为此作者还建议,困于各自罗网之中的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学家都应当将阅读小说置于方法论的高度。^②文学在此书有着点题之功,因为它让国际关系学和女性主义认识了彼此的差异,从而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得以继续“未尽的旅程”;另一方面,对西尔维斯特而言,文学的意义在于体验和理解他者、发现固有视野之外的未知事物,^③这和她始终重视情感、体验^④等非理性、非结构性因素是一致的。

在当期《千禧年》杂志上,如果说众多国际政治学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诸艺进行了多样而深刻的思考,那么其开篇之作必得是提纲挈领的理论总括,须有相当的分量——这便是布莱克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⑤布莱克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的艺术透视,论著极丰,涉及音乐、视觉艺术、

① Christine Sylvester, “Art, Abstra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3, 2001, pp. 535-554. 她在艺术研究领域论著颇丰,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 Christine Sylvester, *Art/Museu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 We Least Expect It*, Boulder: Paradigm Pub., 2009。

②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94-308.

③ 西尔维斯特关于文学的研究成果还可见: Christine Sylvester, “Development Poetic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5, No. 3, 2000, pp. 335-351。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博士生朴姜成柱也曾在学术刊物上撰文,借鉴小说的方式,设计了女性主义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 Park-Kang Sungju, “Utmost Listening: Feminist IR as a Foreign Language”,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2011, pp. 861-877。

④ 她曾在《国际研究评论》上组织过关于情感问题的讨论 “The Forum: Emotion and the Feminist IR Resear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No. 4, 2011, pp. 687-708。“体验战争”(experiencing war)则是她近几年主持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最新著作可见: Christine Sylvester, *War as Experience: Contribu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⑤ Roland Bleiker, “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3, 2001, pp. 509-533.

表演艺术等多个门类^①，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则多有偏爱^②，并曾在学术刊物上主编以“诗学的世界政治”为题的一期专辑。^③2009年，布莱克的《美学与世界政治》一书，可谓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压轴之作，其前半部分专注于理论问题的探讨——“为何说，美学方法是一种理解世界政治的新的的重要途径”——这是在《千禧年》文章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后半部分则以诗歌为例，围绕着策兰、东德诗人、聂鲁达、阿赫玛托娃、高银等作家，展示“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于那些关键的政治难题，美学洞察所能给予我们的新视角”。^④此书虽脱胎于作者之前撰写的多篇论文——包括《千禧年》所载文章——却经重大修改而更趋完备。布莱克与西尔维斯特这两位著名学者存在着两个相似点：在文学研究的背后有着对情感这一非理性因素的长久关注^⑤，文学研究的指向是对国际关系研究基本途径的反思——若说西尔维斯特重视文学的方法论，布莱克则注重文学的认知论：主流的（尤其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研究旨在科学地寻找现实世界的确定真相，美学的路径则承认人们在表达现实世界时的丰富性，并以这种种表达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因为后者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⑥实质上，这与他一贯的学术旨趣是分不开的：早年在一篇从中国古典哲学反思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章中，他便在“庄周梦蝶”故事的启发之下阐述了对“真实”问题的认知论思考。^⑦

在国际政治学界，《千禧年》期刊向以批判性和创造性著称，前述与此刊

①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列举其成果。布莱克个人学术主页有详尽的列表，且提供全文下载链接：<http://uq.academia.edu/RolandBleiker>。

② 以文学为主题或主要内容作品如下：“Pablo Neruda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Memory”，*Third World Quarterly*，Vol. 20，No. 6，1999，pp. 1129-1142。“‘Give It the Shade’: Paul Celan and the Politics of A-political Poetry”，*Political Studies*，Vol. 47，No. 4，1999，pp. 661-676。“Stroll through the Wall: Everyday Poetics of Cold War Politics”，*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Vol. 25，No. 3，2000，pp. 391-408。“Anna Akhmatova’s Search for Political Light”，*Peace Review*，Vol. 13，No. 2，2001，pp. 181-186。“Aestheticising Terrorism: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11 Septemb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Vol. 49，No. 3，2003，pp. 430-445。“Learning from Art: A Reply to Holden’s ‘World Literature and World Politics’”，*Global Society*，Vol. 17，No. 4，2003，pp. 415-428。“Art after 9/11”，*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Vol. 31，No. 1，2006，pp. 77-99。“The Symbiosis of Democracy and Tragedy: Lost Lessons from Ancient Greece”（with Mark Chou），*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7，No. 3，2009，pp. 659-682。“Ko U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colonial Identity”（with David Hundt），*Global Society*，Vol. 24，No. 3，2010，pp. 331-349。

③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Vol. 25，No. 3，2000。该期专辑分为安全、发展、权威三个领域，有十余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既包括西尔维斯特、史蒂芬·陈（Stephen Chan）等国际关系学者，也包括高银（Ko Un）等著名诗人。

④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

⑤ 布莱克亦曾组织关于情感问题的讨论“Forum: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Theory*，Vol. 6，No. 3，2014，pp. 490-594。

⑥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p. 20-29.

⑦ Roland Bleiker, “Neorealist Claims in Ligh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heory”，*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2，No. 3，1993，pp. 401-421.

有所渊源的诸位学者，不少便秉持后现代主义立场或者至少受其影响。^①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家研究文学别无他途可循。^②声名卓著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大师勒博便依循自身理论脉络，在此领域做出了重要开拓。勒博精通德、法、意等多种欧洲语言，在古希腊语、拉丁语上也有相当学识，历史、哲学功底深厚，又雅好音乐、戏剧、诗歌，这些都让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文学与国际政治的纠葛。十余年前，他在《国际政治的悲剧视野》一书中，第一章即以“地狱中的尼克松”为题，将小说写作引入社会科学之中。^③勒博在学界以古典研究著称，善于从经典作品中汲取养料，别出机杼，近年屡获殊荣的著作《国际关系的一种文化理论》，便是借古希腊政治思想为经纬，织就皇皇理论巨著。^④同样，勒博对文学的兴趣，也多在于自经典中读出国际政治的恒久命题，如他研究政治认同的著作便有近半篇幅讨论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莫扎特的歌剧脚本、宗教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⑤2012年，他与厄斯金主编的论文集《悲剧与国际关系》，将悲剧这一国际政治常见的喻象直接转变为与后者对话的主体，吸引了包括布朗、伦格等一流国际政治思想家在内的多位学者参与讨论。尽管彼此观点并不统一，但两位主编撰写的导言和结论以及勒博自己的文章，都明确展现了他的一贯风格。他所思考的是文学巨匠——尤其是古希腊剧作家和莎士比亚——所揭示的悲剧性主题，是在国际政治中回响着的人之存在的本真。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国际政治的悲剧主题，其一是以俄狄浦斯系列为代表而在古希腊作品中常见的“hubris”（疯狂、傲慢、逾越）——一战、二战中的德国和冷战后的美国可资佐证；其二是由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和埃斯库勒斯《俄瑞斯特斯》所揭示的伦理难题：普世的、绝对的“正义”实难存在，不同的伦理标准之间时常存在冲突，使人们面临着“忠孝难两全”式的困境——这在摩根索、尼布尔、巴特菲尔德等国际关

①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有着天然的关联，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不例外。夏皮罗、德·德里安、坎贝尔（David Campbell）、沃尔克（R. B. J. Walker）等后现代主义名家，虽然并非都以文学见长，但都在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② 布莱克提及怀特、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阿尔克（Hayward Alker）、布朗、哈利迪等著名学者，他们并非后现代主义者，但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文学有所借鉴。Roland Bleiker, “Learning from Art: A Reply to Holden’s ‘World Literature and World Politics’”, pp. 415-428.

③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该书已有中译本，见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⑤ Richard Ned Lebow,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 In Search of Our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此前他已对此有所思考，如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08, pp. 473-492.

系理论前辈的著作中亦有涉及。^①

我国著名学者时殷弘教授也在此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他在教学和研究中始终提倡“文学透视”，即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辨识、思考、组织和讲述故事，以便认识和展示对象的基本特性甚或深层机理……形成或明示或隐含的主题，或曰主要道理。”^② 笔者以为，时先生的“文学透视”，作为一种叙事方式，远非简单的行文表述，而反映了方法论上的深刻思考，^③ 正因此，他可以断言——“这种方法的地位可以说不亚于历史理解和哲学理解，更不亚于那往往必须在赞誉其重大价值的同时警戒其弊端的狭义的‘科学’方法。”^④

以上仅是笔者粗疏的整理，或许未能涵盖国际政治学者以文学观世界的全貌。^⑤ 虽进路各有所异、方法各尽其妙，这些学者在探索这一领域时，却多少都指向了根本性的问题：以文学艺术为透镜和以社会科学为工具，两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何不同？

①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Ned Lebow,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ragedy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clusion: Learning from Tragedy and Refocu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chard Ned Lebow, “Traged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Ned Lebow, eds., *Traged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20, 63-74, 185-217.

② 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第25页。笔者在本文中所用的“文学透视”一词，即借自这一提法，虽则所指有所不同。时先生的高足张云雷和李隽扬博士为笔者做过详细的介绍，在此表示感谢。

③ 与此相映照的是，史学和哲学领域也都有顶尖学者倡导和实践文学式的写作方法。史景迁以文学的手法来获得最佳的史学写作效果，而赫斯勒（Vittorio Hösle）则更为直接地提出“哲学必须使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内容”。参见郁喆隽采访《赫斯勒访谈：好的道德理论需要现实的人类学》，《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4月3日，第6页。

④ 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第24页。

⑤ 如英国学者摩尔专注于对暴力的文学透视，并组织过“美学与国际政治”的专辑：Cerwyn Moore, “Aesthe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s a Global Politics” (with Laura J. Shepherd), *Global Society*, Vol. 24, No. 3, 2010, pp. 299-309 “On Cruelty: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Global Politics”, *Global Society*, Vol. 24, No. 3, 2010, pp. 311-329 “Reading the Hermeneutics of Violence: The Literary Turn and Chechnya”, *Global Society*, Vol. 20, No. 2, 2006, pp. 179-198。德国学者霍尔顿一贯反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美霸权，他对电影和文学情有独钟，在研究中也是从颇具德国主体性的“世界文学”概念出发来诠释“世界政治”，并与布莱克有过论战：Gerard Holden, “World Politic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Cinema”, *Global Society*, Vol. 24, No. 3, 2010, pp. 381-400 “World Litera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 Search of a Research Agenda”, *Global Society*, Vol. 17, No. 3, 2003, pp. 229-252 “A Reply to Bleiker’s Reply”, *Global Society*, Vol. 17, No. 4, 2003, pp. 429-430。英国学者希兰著有《文学与国际关系》一书，虽提出了宏大的计划，理论框架却有所不足，案例也驳杂不纯：Paul Sheeran,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ories in the Art of Diplomac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3。以上这些学者的作品，仅是笔者个人以为价值和影响较小，故未列入正文而在注中备考。

二、建构：文学透视的理由

倘若文学透视无法在社会科学路径之外，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无论其作为学科还是本体——的认识和理解，那它至多只是一种依附性的装点，只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生动的注脚和有趣的类比，不仅无法获得作为独立研究路径的主体地位，甚至可能沦为奇技淫巧，遭到合法性的质疑。可以说，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也是学术伦理的问题。布莱克在其《美学与世界政治》中开篇便言“当世界淹没在战争、种族屠杀、恐怖主义、贫穷、气候变化和金融动荡之中，探索美学主题是否不值一提，甚或不负责任？”^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上述学者中，有些直接阐释文学透视的意义，有些则通过具体的研究静默地展现其价值。笔者则试图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贡献自己的思考，探讨文学透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作用和方法。

但首先，我们不妨品读一下朱光潜先生关于文之载道的一段妙语：

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哲学科学所谈的是“道”，文艺所谈的仍然是“道”，所不同者哲学科学的道是抽象的，是从人生世相中抽绎出来的，好比从盐水中所提出来的盐；文艺的道是具体的，是含蕴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盐溶于水，饮者知咸，却不辨何者为盐，何者为水。^②

朱先生又进一步将哲学科学之道称作“客观的、冷的、有精气而无血肉的”，将文艺之道称作“主观的、热的、通过作者的情感与人格的渗沥，精气与血肉凝成完整生命的”。若我们将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国际政治之道的求索，那么朱先生的这段比较，无疑形象地概括了国际政治之文艺透视的价值和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文艺的透视之间的根本差异，或许便在于，前者重视对“物”自身的考察，后者则偏重对“心”——即人之观念——的洞察。

一方面，心无法脱离物单独存在，所以毋宁说，文艺的透视所专注的，是通过作品所呈现的心对物（观念对现实政治）的映照，是“渗沥”着“作者的情感与人格”的国际政治的影像。另一方面，物总是通过心来呈现和表达，否则便只是孤寂的存在。王阳明之语“你未看到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①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 1.

^② 朱光潜《谈文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6页。

你来看此花时，则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不能简单地被判作主观唯心主义谬论，因为有时，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游离于我们之外的“客观”世界，而正是对此的理解与诠释。^①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区分作为观察者的主体和作为被观察者的客体，外在、冷静、客观地进行审视；文艺的透视则恰恰相反：政治现实在文艺作品中得以描摹，作者在文艺作品中表达自我——或曰寄物移情，研究者和欣赏者则要将自身“投射”在作品和对象中，达至“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这“忘却”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界限的契机，重新认识他者和自我，理解世界，理解政治。

就认识他者而言，我们可引斯蒂格勒的判断“政治问题即美学问题，反之亦然，美学问题即政治问题”，因为艺术的核心问题即是“对他者的感知”（*la sensibilité de l'autre*），而“政治问题在本质上便是蕴于共同感觉（*un sentir ensemble*）——意即同情（*sympathie*）——之中的与他者的关系问题”。^②另一方面，文艺透视又将个体从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抽离，创造了一种“审美距离”以审视自我的世界，如伽达默尔所言“正是从他作为观赏者而丧失自身这一点出发，他才有可能指望达到意义的连续性。这就是观赏者自身的世界的真理，他在其中生活的宗教世界和伦理世界的真理，这个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他在这个世界里认识了他自己。”^③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跳脱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我”之固见，在“忘我”中通过文艺作品来反观自身。

简而言之，对“照物之心”的洞察，是在“体验”中获得“同情之理解”——这也是强调文学方法的西尔维斯特如此注重“体验战争”的原因。固然，对国际关系中的观念、知觉乃至情感这些非物质的因素，学者们亦不乏通过科学方法甚至定量手段进行研究的努力，然而，再精妙的科学分析或许也及不上“闻弦歌而知雅意”——毕竟，知晓心事，并非计弦断之数，而是听弦断之音。

以上或可看作是普遍意义上的“文艺”透视，而“文学”透视则更有其

① 伽达默尔的经典之作《真理与方法》便是以对艺术和审美的讨论为起点，构建诠释学的哲学大厦，试图反思和对抗“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4页。笔者不通德文，不敢妄言伽达默尔，但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克关于美学与世界政治的思考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颇大。

② Bernard Stiegler, “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Le monde*, Octobre 10, 2003. 这篇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文章后收入同名文集作为开篇：Bernard Stiegler, *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 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 Paris: Galilée, 2004. 文集亦已译作英文：Berg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ume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trans. by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第180页。

独特之处。其一，文学的载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而又最分裂的要素之一：语言。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信息的沟通工具，更是构成我们思维方式的土壤：“我们最终需要语言来理解我们世界的意义”，在语言的进程之中“表达和理解我们自身及周遭的环境”。^①或者说，文学正是通过语言（而非节奏旋律抑或色彩笔触）来实现“心”对“物”的映照，达成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融合。^②与之相应，不同族群对世界政治的认知差异，也往往在语言的翻译——尤其是意义和意境的转换——中显露无遗。^③其二，文学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更强调一种再创造性——“文学以及在阅读中对它的接受表现了一种最大程度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我们不需要一口气地读完一本书，以致重新接受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继续读”；阅读、朗诵、表演，这种种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本身便是作品本质的一部分，正是通过作为接受的再创造，“文学的此在并不是某种已疏离了的存在的死气沉沉的延续……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并且因此把它的隐匿的历史带进了每一个现时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气的文化传统”。^④

一言以蔽之，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不是致力于研究现实本身，而是以古往今来的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思考和观感为对象；它不是汲汲于阐明客观的科学之“理”，而是在阅读、欣赏、诠释乃至再创造中理解和体味国际政治所表现出的各种面相。由此，以心—物关系为总括，我们便能寻得国际政治之文学透视的两个支点：虚—实与共—殊。

（一）虚—实

瑞典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在访谈中说道：“文学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会强迫外在世界显形，展现它的面目，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打开我们的眼界”。^⑤正因为这双重世界的合一，文学作为观者之“心”对现实之“物”的映照，又是介

① Roland Bleiker,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Poetic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5, No. 3, 2000, p. 269;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 4.

②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借鉴语言哲学的话语分析亦非鲜见，但这种方法似乎更多地针对政坛言论和媒体报道，而较少用于文学作品，且在研究中又多为客观的审视乃至批判，与本文的“文学透视”并不相类。

③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Peter Mandaville, “Glocal Hero Harry Potter Abroad”, in Daniel H. Nexon and Iver B. Neumann, eds., *Harry Pott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5-59; Ann Towns and Bahar Rumelili, “Foreign Yet Famili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eception of Potter in Turkey and Sweden”, *Ibid.*, pp. 61-77.

④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I》，第 226—227 页。

⑤ 《诺奖评委会前主席：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新京报》，2012 年 10 月 24 日，C1 版。他继而又说“文学常常被政治辩论所掩盖，人们常常忘记了文学是一个自在的世界。”

于虚实之间的微妙存在。然而，自在的世界与外在的世界，虚与实，这只是简单的对立吗？文学是否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虽能反映某些真相，毕竟只是基于直觉与感性，在对现实政治的揭示中，比不上社会科学的缜密透彻、客观理性？

科学的方法不满足于社会纷繁的表象，而是要直透事物的本质，寻找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阐释其规律，它的核心是抽象，基础是数学。譬如小学应用题中常见的火车相对行驶何时相遇的问题，火车被抽象为质点，自身的质量、长度都不予考虑，更不用说外观等诸多因素。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就好比绘制地图，它虽与亲眼所见的景象相去甚远，却清楚、抽象而精确地勾勒出了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至于什么是核心要素则可以人为规定，由此便有了水利地图、交通地图、军事地图之分，恰如“科学”的本意便是“分科之学”，^①面对同样的世界，依学科不同有着各自的基本概念与假设。^②

地图可谓一种“上帝的视角”，浮于大地之上，游离对象之外；与此相反，文学的视角则如同绘画，它总是在一个具体的角度描绘着周遭之物。“透视”（perspective）一词在美术中的本意，便是近大远小，正如文学总是着墨于主要角色或者意象，聚焦一点而“透视”整体，却并非要将鲜活的现象撇去，抽象出某种普遍的结构、规律。

文学的透视既是心对物的映照，便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总免不了主观的沾染。站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目光观察和描摹政治，就会有不同的“透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强调“体验”、“移情”，既要求忘却物与我、主体与客体，文学的透视便是一种“在其中”的方式，绝难达到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像绘制的地图一样识得和展示世界的“真”面目。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真实又恰恰是一种真实：因这鲜活的景象，便是在某时某地某人亲见的一切，它并未被剥去血肉，化为无形无象的质点，也并未被人为割裂，化作各门各科的路线图。这种文学真实或曰艺术真实的价值，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中表露无遗——“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

① 中文“科学”一词来自日语，后者则对应近代德语的 Wissenschaft，最初便是指分科之学。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第46、49页；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蒋劲松译，载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3页。

② 国政学界众所周知，摩根索六原则中的最末一条便是对此的专门论述。

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 所学到的东西, 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不过, 文学毕竟不等同于非虚构性写作, 不全是对所见的照实记叙, 它必然含着虚构、扭曲乃至浪漫的想象, 这样的作品对我们认识国际政治又有何意义? 实质上, 虚构并非虚妄, 看似与“实”对立, 却往往是本真的再现和放大。作为双重世界的文学, 在自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桥梁, 便是虚与实的相反相成。这在艺术上并不难理解, 尤在绘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形之不似, 乃为神似。我们最为熟悉的例子, 是顾恺之为裴楷作像时所增添的“颊上三毛”,^② 而貌似将真实发展到极致的西方近代肖像油画, 也同样脱不开虚实之间的勾连。有评论者如此言说伦勃朗 “我们知道在每个显露的影像背后, 存在另一个更忠实于事实的影像, 而在那背后又有另一个影像, 在最后一个影像后头还有另一个, 以此类推到那无人能见的真实影像。伦勃朗的画, 便是在寻找这不得见的真实影像”, 因他刻意“放弃凝视”, 让所要描画的对象在思维中“暂时离场”, 将其外在的一切“隐到模糊晦暗的背景中”, 只是“画出留在心里的脸”。文学的虚构, 又何尝不是在“寻找这不得见的真实影像”!^③ 在作者主观之“心”的渗沥中, 自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短暂背离却让对后者的透视更为明晰, 虚实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同样是对“现象”的超越, 科学的研究是去其发肤, 凸显肌理骨架, 文学的虚构则是改其面目, 益增神韵识具。

在一切文学形式中, 最尚“虚”的无疑是诗。诗几乎是纯粹的自在世界: “它不过是一种道说和谈话而已。作诗压根儿不是那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的活动。诗宛若一个梦, 而不是任何现实”; 然而, 这种“非现实和梦幻”却是一种假象, 实则, “诗人所道说和采纳的, 就是现实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现实“都是生活的梦幻”, 而诗则“触着人在这片大地上的栖居的本质……深入人类此在的根基”, 在其中, “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惟有诗之“虚”, 才能反而道说本真。^④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 这便类似于前文所述的“庄周梦蝶”。简而言之, 在国际政治中, 我们习以为常的“真”——如现实主义的逻辑——的确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吗? 我们一笑而过的

① 恩格斯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683—684页。

② 《世说新语》: “顾长康画裴叔则, 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 顾曰 ‘裴楷俊朗有识具, 正此是其识具。’ 看画者寻之, 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 殊胜未安时。”

③ 柳青 《寻找那无人能见的真实影像》, 《文汇报》, 2012年9月28日, 第1版。

④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第35—50页。

“梦”——如永久和平的论说——是否包含着某种本真？虚与实，“则必有分矣”，但其间似乎并不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边界，两者的对立统一，大约也是庄子所言的“物化”。

（二）共一殊

正是在心对物的映照（表达）和心对心的体验（接受）中，一个时空环境下的事物可以在其他的时空环境下展开自身：文学自然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它总是作者个人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尽管后者在文学之镜中可能平实再现，也可能被折射、扭曲乃至颠倒；但它又不止于展现特定时代的殊相，而是经由阅读、朗诵、表演等再创造，进入每一个历史的“现时”，从而具有永恒的意义。我们尤其在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中能够找到这种“共相”：“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仍然还是意味深长的”，同样，一部文学译著的存在也证明，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对于一切都始终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①

经典作品既是历史共相与时代殊相的相融，从中透视国际关系，便有了思想史的意味。众所周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两种最基本的途径。其一是所谓“观念史”的方法，试图寻找历史发展过程中绵延不绝的基本主题——历代思想家围绕着这些主题的思考构成了一个具有延续性的传统，即“伟大的存在之链”。^② 已为国人熟知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便是此中极致，致力于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追寻那些永恒的“真正标准”。^③

另一种途径则强调特定历史环境对思想家及其著作的影响，其中又分两种方法，传统研究者如萨拜因等人更强调客观环境对思想家的影响，重在厘清思想的“历史”事实；另一派则以晚近兴起的剑桥学派为代表，主要抨击从文本中寻找永恒价值的“解经”派学者，斥之为“文本主义”（textualism），但也不完全同意秉持“环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传统学者，认为此种方法有滑向环境决定论之虞；他们更强调思想家各自在解答政治问题时的意图、动机^④——“只存在着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回答——而有诸多不同的问题就有诸多不同的回答，有诸多不同的提问者就有诸多不同的问题”——并因揭示作者意图和思想内涵而尤为注重其所处环境中的语言惯例和具体概念的含义，这种方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I》，第 227 页。

② 这可以追溯到：A.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Vol. 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③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 No. 3, 1957, pp. 343-368.

④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No. 1, 1969, p. 50.

法也常被称作“语境主义”(linguistic contextualism)。

以上两种途径并非不可兼容,若将国际政治思想史置于文学的透镜下来观察,则它们恰可作为两种进路,探查经典的共相与殊相。

例如,在《悲剧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勒博和厄斯金两位主编并非没有注意到古典学家的意见:古希腊悲剧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必须被置于当时的情境中,是帮助我们理解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更广泛地说,希腊人的生活——的中介”;但他们虽对这种观点表示尊重,却坚持认为,“文本所承载的意涵超越了作者所意欲的范围,文学体裁亦是如此”,通过对悲剧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说不定还能解答——那些或许超越了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范围的问题”,而在此书的编撰中,他们的核心假设便是“借由赏析悲剧,我们能增长识见,此种识见系于今日之世界,正如系于那催生了这一题材的殊异环境”。^①如前所述,这反映了勒博从古典作品中找寻永恒价值的学术抱负。

然而,如拾起他们所搁置的另一维度,从悲剧中探求雅典作家和时人“在解答政治问题时的意图、动机”,则不啻为思想史研究辟出一片新的境地。既有的国际政治思想史著作——不论是布歇的皇皇巨著,布朗等一众知名学者主编的经典文献导读,或是汤普森的通俗小册子^②——都不脱历数名人的套路,在论述古希腊时几乎从未走出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之外,却忽视了悲剧、喜剧、诗歌这些重要的素材,而后者恰恰是感知和理解当时国际政治观念的绝佳文本——对其加以考察,与对永恒价值的探究,有着同等的意义。

共与殊,同虚与实一样,相生相和,相反相成。历史由每一个“现时”组成,对经典作品而言,共相寓于殊相,殊相通达共相。自文学透视国际政治,便是在体验和移情中,沟通“那时”和“此刻”,联结作者、当时的受众和当下的读者,既从文本自身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中读得彼时彼境的政治思想,又从其鸣响中倾听世界政治的恒久动机。

^① Toni Erskine and Richard Ned Lebow,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ragedy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 8.

^② David Boucher, *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ucydid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布朗、南丁、里格主编《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一战的文本》,王文、张胜军、赵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克努成所撰《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一书,则根本略去了古希腊时代。

三、个案 《亨利五世》的理解

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已毋庸多言。与荷马、但丁、歌德一样，这位英国文豪是西方文教谱系中的一座高峰，其作品之博大深邃，远非单纯的文学一科所能容纳。莎翁戏剧，时常聚焦人类命运的幽深之处，直指政治哲学的根本主题，引得政治思想界的两大阵营——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不约而同为之着迷：施特劳斯的两位亲炙弟子、已故的学界巨匠布鲁姆和雅法，早年即合著《莎士比亚的政治》一书，探求莎翁笔下的微言大义；^① 剑桥学派的一代宗师斯金纳，则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了莎翁作品里庭辩修辞的运用。^② 国内外高校中亦不乏以“莎士比亚的政治”为主题开设的课程。^③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业已被证明是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文本，那么，它又怎可能与国际政治无涉？

并非没有国际政治学者注意到这位经典作家。如前所述，鲁尔克的经典教材《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大量引用莎士比亚作为篇首语，但这似乎更多地只是一种吸引学生的趣味手段。勒博和厄斯金主编的《悲剧与国际关系》一书，将莎士比亚戏剧与古希腊戏剧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囿于主题，并未涉及莎翁的历史剧、喜剧和传奇剧，尽管后者同样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

莎士比亚研究在政治学界早有丰厚土壤，在国际政治领域亦有学者问津——虽则仍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宝藏。去年恰逢莎翁诞辰450周年，明年则是其逝世400周年，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以这篇文章的研究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学人对莎翁的致敬。

在莎士比亚诸多作品中选择《亨利五世》，是因为这部历史剧直接关联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战争。此剧原名即为《亨利五世编

^① 布鲁姆、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施特劳斯学派在国内的推广者，也选译出版了数种以莎士比亚为主题的论文集：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彭磊选编《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② Quentin Skinner, *Forensic Shakespe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笔者200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访学时，旁听过政治学系斯蒂姆森(Shannon C. Stimson)教授开设的研究生讨论课，首次接触到这一主题，印象颇为深刻。

年史,及其在法国阿金库尔的作战》。^①正因如此,它不仅“渗沥”着莎士比亚对这位君主、对百年战争乃至对普遍意义上的战争的思考,又在四百年的接受史中,随着时政的变迁不断地重新被演绎、被诠释;^②作为历史剧,它以君主个人为焦点透视国家和政治,又将虚构与真实结合在一起;从中,我们既可以读出那时的观念,也能够思考永恒的主题。^③接下来,笔者试着依循虚—实、共—殊两径,移情其中,诠释莎翁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观照。

(一) 虚—实

《亨利五世》的核心内容,是君主的合法性和战争的合法性,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的。在此剧前导《亨利四世》的下篇中,那位王位来之不正的国王在临终前给未来的亨利五世的最后遗命便是:

我是用怎样诡诈的手段取得这一顶王冠……在我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在你却是合法继承的权利。可是你的地位虽然可以比我稳定一些,然而人心未服,余憾尚新,你的基础还没有十分巩固……所以,我的哈利,你的政策应该是多多利用对外的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们有了向外活动的机会,不至于在国内为非作乱,旧日的不快的回忆也可以因此而消失。^④

于是,在《亨利五世》的开场致辞中,主人公的全部品质就是“勇猛善战”(warlike),“在他的脚后跟,‘饥馑’、‘利剑’和‘烈火’像是套上皮带的猎狗一样,蹲伏着,只等待一声命令。”

若是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我们必得抽去这有血肉的形象,从决策过

① 1600年的第一四折本(First Quarto)以此为标题(THE CRONICLE History of Henry the fift, With his battell fought at Agin Court in France),而在1623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中,标题则变成了“亨利五世生平”(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此剧四折本和对开本的文本颇有不同,哪一个更接近莎士比亚的原意,研究者仍有争论。

②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1944年和1989年的两个电影版本,出于不同的目的,两者对原作的台词做了不同的取舍,以大相径庭的电影语汇各自诠释了这部作品。参见Donald K. Hedrick, “War Is Mud: Branagh’s Dirty Harry V and the Types of Political Ambiguity”, in Richard Burt and Lynda E. Boose,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II: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Video and DV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13-230; 程朝翔《莎士比亚的文本、电影与现代战争》,《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第30—43页。

③ 《亨利五世》作于1599年,是莎士比亚八部英国中世纪历史剧中的最后一部,也是其第二组历史四联剧——即《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部、《亨利四世》第二部和《亨利五世》,亦称作“亨利剧”(Henriad)——中的收尾之作。该剧以英法百年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415年英军大获全胜的阿金库尔战役为中心,描绘了亨利五世作为战争发动者、领导者和征服者的王者形象。它在莎翁生前和身后均广受欢迎,也备受争议。

④ 《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五场,此处为朱生豪译文。本文所引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译文,主要出自方平译本,并参考梁实秋、刘炳善译文,笔者亦在必要之处稍作改动。主要参考的英文文本是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程、国内矛盾和国际格局等诸层次，分析或宏观或微观的种种机制。但在文学透视中，我们却离开“绘制地图”的状态，落在这幅肖像画之前，我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抽象的机理乃至全面的分析，而是亨利五世作为战争发动者最“真实”的一个定格，以及战争最“真实”的三种面相“饥馑”、“利剑”和“烈火”。

接着，整个第一幕便将这样的个人形象置于两对交错的矛盾之中：亨利五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他与法国王太子的关系；而两者重合的焦点就是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或者说开战正义（*ius ad bellum*）。

在西方传统中，对开战正义最基础的表述无疑是奥古斯丁的三原则：正义的理由、正确的意图、正当的权威。然而，《亨利五世》却以鲜活生动的描绘，引我们进入原则背后的复杂之境。

作为合法的继承者，争夺本属于自己的法国王位，这似乎是再正义不过的理由，就像如今的国家争夺“自古以来”属于自己的财物和领土一样。但亨利五世的依据，是女性子嗣的继承权，这却涉及莎士比亚时代观众记忆犹新的英格兰王位问题：若女性先祖的血统可以成为继承王位的理由，则合法的英格兰国王就不是伊丽莎白一世，而是被她处死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如此，何以确定正义之理由？

姑且认为，继承权是一个正义的开战理由，那么，由要求几个公国悄然变作要求法国王位，因受法国王太子之辱而谋求以战争进行报复，这些能否称作“理直气壮地……算账”，“来干……正大光明的事业”？熟知《亨利四世》中临终之语的观众，会对亨利五世的意图有更深一层的怀疑。然而，在莎士比亚笔下，这种种意图如丝麻般交织在一起，交互闪现，似乎连国王本人也无法厘清和切割。的确，“他的那些伟大目标——征服法兰西、从政治上统一英国、保证他自己兰开斯特家族的王权——似乎全部都是为了英国的大众利益。”^① 如此，何以判定正确之意图？

作为国王，亨利五世自然是发动战争的正当权威。但他的王位来历颇有可疑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巩固王位合法性也是发动战争的潜在因由之一。这便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合法的国王身份既是合法开战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如此，何以规定正当之权威？

不仅如此，在短短的第一幕中，莎士比亚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我们不难从坎特伯雷大主教身上忆起，自奥古斯丁至伊丽莎白时

^① 普罗《哈利王子：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亨利五世〉新解》，杜佳译，载于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第19页。

代，对正义战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裁定权几乎始终垄断在僧侣这一知识阶层手中。即使亨利五世早已有了开战的决心，即使他本人在宗教上的造诣毫不低于大主教——“听着他宣讲神圣的教义，你不由得五体投地，私下但愿让皇上当上了牧师”——他仍然需要宗教/知识的权威来做证明，即便大主教的繁琐论证无人感兴趣。反过来，教会支持开战，又是指望从国王这里获得好处。于是，正义战争学说本身的合法性也在莎翁绘制的图景中染上了福柯式的阴影。

这正义战争的重重矛盾，在第一幕终结时获得解决，但并非通过理论的证明，而是通过亨利五世简洁的命令：“让这一正义的行动（fair action）得以推进”。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陷入哲学沉思的哈姆雷特全然不同的王者，惟其如此，他注定不会成为悲剧，而是成就伟业。“行动”（action），这就像亚历山大以手中利剑斩断戈尔迪之结，就像浮士德笔下以“有为”取代“有道”和“有言”，超越了道德的评判，从而克服了正义问题的内在矛盾。^①作为果决的行动者，正如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亨利五世因其强力意志，不是服从伦理，而是重估价值。

然而，这业已解决的矛盾，却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又被揭开，能够超越理论思辨的“行动”，却在培茨、考特和威廉斯这三个虚构的普通小兵那里遭到了质疑。^②乔装改扮的亨利五世确信，在国王身边战死沙场是士兵之幸，因为出征法国是“正义之业，师出有名”（his cause being just and his quarrel honourable）。威廉斯却颇为犬儒地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表示了怀疑。培茨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追随国王就是最大的正义，即使参加不义的战争也不用承担罪责。但威廉斯没有停留在士兵们身上，而是指向了国王的责任：“可是，如果这不是师出有名，那么国王头上的这笔账可有得他算了。打一场仗，有多多少少的腿、多多少少的胳膊、多多少少的头要给砍下来；将来有一天，它们又结合在一起了，就会一齐高声呼号‘我们死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说，如果这班人不得好死，那么把他们领到死路上去的国王就是罪孽深重了。”

亨利五世的辩解极为牵强，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不然也不会有其后大段的独白。他与这虚构的三个小角色之间的对话主题，可以说涵盖了——或者毋宁说超越了——开战正义和战时正义（*jus in bello*）的范畴，因为它直指战争之根本：杀戮与死亡。

战争的残酷，亨利五世早已料到，在第一幕中他自己便说：“这样两个王

^① 作为文学形象的亨利五世与亚历山大之比较，可参见：Judith Mossman, “Henry V and Plutarch’s Alexander”,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45, No. 1, 1994, pp. 57-73.

^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虚构小角色，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一般都没有名姓。

国，一旦打起仗来，那杀伤决不是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在战争里流出的每一滴无辜的血，都是一声哀号，一种愤慨的责难。”然而那时，这只不过是种政治话语，只涉及无关痛痒的理论证明，也自有大主教为其负责。“要不然，让罪孽降临到我头上来吧”。但现在，“死亡”走出宫廷和书斋，不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鲜活的现实。“一将功成万骨枯”，王者的“行动”能利落地摆脱抽象的玄思，却终究要在鲜血的沾染下失色。

但莎士比亚对战争和君主合法性的思考，并未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四人关于战争、正义、死亡和责任的虚拟对话，最终在亨利五世的内心独白中达到了高潮。“要国王负责！那不妨把我们的生命、灵魂，把我们的债务、我们的操心的妻子、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罪恶，全都放在国王头上吧！他得一股脑儿担当下来。随着‘伟大’而来的，是多么难堪的地位啊；听凭每个傻瓜来议论他——他们想到、感觉到的，只是个人的苦楚。”国家作为暴力的合法垄断者，或许本身就有着某种原罪：要实现自身的伟大，就必得以千百万本国和他国人的生命来祭奠。国王作为元首，成就国家之伟大，也承担国家之罪责。正如“君子远庖厨，不忍见其死”，厨子有责任提供美饌，却必得代常人担起这杀生的罪孽。作为整体的国家与作为个体的民众，在战争中有着最为尖锐的对立，这两种同样不可推卸的“必然”责任撕扯着国王的内心，也困扰着对战争合法性的思考。这虚构的三人，无疑是莎翁为亨利五世所添上的颊上三毛，更“真实”地显现了这角色的神髓识具。

莎士比亚对发动战争的亨利五世是褒是贬，学界历来意见不一。笔者以为，莎翁无意给出主观的评价——这并非是文学家的任务——而恰恰是要通过自己的笔触，在亨利五世身上，集中展现战争和政权合法性的矛盾和困境，让观众通过对角色的凝神注视，去体验、去思索。^①

（二）共一殊

从特殊性还是从永恒性去理解和研究莎士比亚，这已经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主题。^②当然，这两种路径并不矛盾，只是各自体现了经典之作的殊相和共

^① 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可参见苏利文《表演家：马基雅维利的“表象君主”亨利五世》，载于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第145—176页；Paola Pugliatti, *Shakespeare and the Just War Tradition*,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3, Chapters 8 and 10.

^② 例如，《政治性的莎士比亚》这部广被引用的论文集，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强调从物质力量和生产关系的角度、从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生产制度中去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爱丁堡莎士比亚与哲学批判研究》丛书的主旨，则正是张扬莎翁作品“为天地立心”的宏大性，反对将其作品缩略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Kevin Curran, “Series Editor’s Preface”, in Alex Schulman, *Rethinking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Lear to Leviathan* (Edinburgh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 and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相。《亨利五世》的时代特征，已有众多学者作了细致的研究，此剧对伊丽莎白一朝时事——如埃塞克斯伯爵远征——有诸多涉及，这也早已成为读者的常识。单就国际政治而言，这部历史剧最值得注重之处，是对其时民族国家观念的展现。有学者指出，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在政治和政治哲学上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便是“现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①而《亨利五世》，正集中反映了新兴民族国家在观念上对基督教的超越和取代。

自整部戏剧开始，教会相对于世俗君主就始终是依附性的存在，这显然让人想起，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治下，英国成为天主教世界中第一个与罗马教会决裂的国家，从而真正完成了向近代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理由”最早的实践者。剧中的亨利五世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而是在伊丽莎白时代逐渐成形的不列颠。在此剧的核心场景阿金库尔战役里，莎士比亚让威尔士人弗鲁爱林、爱尔兰人麦克摩里斯和苏格兰人杰米与英格兰军队并肩作战，这象征着对“不列颠诸岛上最后的蛮荒之地的驯服——在十六世纪，这些地域代表着……日渐式微的部族主义注定消亡的阵地”。^②

不过，新兴的民族国家并非简单地否定宗教，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取代或者说承接了宗教的作用。这在第四幕，阿金库尔战役前亨利五世那段著名的演说词中有着最佳的呈现。他说，这一天（克里斯宾节）发生的英雄事迹将会被国人永远铭记“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远不会随便过去，而行动在这个节日里的我们也永不会被人们忘记”。偶然的、必死的个体如何同永恒与不朽相连？这原本由宗教——通过信仰和救赎——来提供解答。但在莎士比亚时代，宗教已逐渐隐退，于是，“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③安德森曾引用德勃艾之言“是的，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兰西是永恒的”。^④同样，剧中亨利五世不啻是在告诉观众“生而为英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不列颠是永恒的。”

他接着又说道“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we band of brothers）——因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brothers）。”“兄弟”，这本是基督教常用的语汇，在教会中，

① Alex Schulman, *Rethinking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Lear to Leviathan*, p. 1.

② Stephen Greenblatt, "Invisible Bullets: Renaissance Authority and Its Subversion", in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p. 42.

③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④ 同上。

不同血缘的人获得了共同的身份，如在家庭中一般，彼此互称兄弟，并可达成宗教意义上的“博爱”。^①但在莎士比亚时代，民族国家作为新兴的力量，已然成为维系民众的基础——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亨利八世之后，英国已脱离天主教大家庭——只是在此时，它还未能提供“公民”身份，只能借用延续自宗教的“兄弟之情”（brotherhood）。无独有偶，诞生于18世纪的法国国歌，首句便有“祖国父亲的孩子”（enfants de la Patrie），谱写于19世纪的意大利国歌，开头就是“意大利兄弟”（fratelli d'Italia），它们的主题也都是对外战争，这绝非简单的巧合。国家代替宗教，筑造了孤立的个体通向广大的共同体的道路，只不过，从前依靠分享圣血，现在则是共同流血。

亨利五世战前演说中这相邻的两句话，可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别显现了国家是如何通过战争拓展个体，使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化入“大我”的，而这在不久之前，还是宗教的作用。或者说，我们通过莎翁的这部戏剧，感知了民族国家这一利维坦的兴起——此处，笔者另有一个虽属细节却颇为有趣的问题：在哈弗娄城下，亨利五世的确提到了“利维坦”这个词（虽则中译本以“鳄鱼”或者“鲸鱼”名之），用它来比喻国家在战争中不受控制的强大力量，这与稍晚于莎士比亚的霍布斯对此概念的运用似乎相当接近。然而，很少有学者对此有所关注，即使施米特也只是简单地认为，莎士比亚只不过将利维坦“引用作一个强大的、无比健壮或者无比敏捷的海怪，不带任何政治—神话指向的象征意义……既无涉中世纪神学的魔鬼说，也无涉一种形而上学地确定了敌意”。^②但《亨利五世》中的“利维坦”，实在不能不令人想起主权国家的形象。假如有心人对此做一概念史的考察，或可探究国际政治观念的时代殊相，别有所得。

如果说，上述这些段落赋予我们透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观念的窗口，那么它也未必不能带我们走入更为永恒的主题。如前所述，勒博等学者在《悲剧与国际关系》一书中，认为悲剧的永恒主题之一，是安提戈涅式的困境：不同的伦理标准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国际政治而言，两难的一方往往是共同体——城邦、国家、民族等——的原则或“理由”（raison），另一方则是更加普遍的原则，如亲情、人道等。在《亨利五世》中，国家超越了宗教，成为人们最基本的伦理指向；然而，莎翁却在戏剧终场的高潮处，让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原则——爱情——以奇特的方式介入，掀起了小小的冲突。之所

^① Fraternity 一词的词根是拉丁语的 frater（兄弟），因而其含义与 brotherhood 一致。

^②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63页。

以奇特，是因为无人不知亨利五世出于政治需要才与法国公主联姻，这刺刀下的结合，却偏要以浪漫的求爱来表现；之所以戏剧冲突不大，是因为它在寥寥数行中就得解决，引向了最终的欢乐结局。

当凯瑟琳问道“我——可能爱——法兰西的敌人吗？”永恒的难题便出现了，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和 19 世纪歌剧《阿依达》中，它以主角的死亡作为解决；在 20 世纪初的歌剧《图兰多特》中，它则以作者的死亡作为解决。^①亨利五世承认了这种困境“不，这不可能，你不能爱法兰西的敌人”，但随即以近乎儿戏的方式应对道“当法兰西属于我了，而我属于你了，那么，属于你的的是法兰西，而你是属于我的了”；法国王后也愉快地祝愿这位征服者和继承者“一对夫妇，由于相爱，就结成一体；但愿两个国家同样地似胶似漆……但愿英国人就像法国人，法国人就像英国人一般，你敬我爱吧！”

至此，严肃的正剧变成了笑剧，正经的历史变得荒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莎翁此剧的缺陷，却可能恰恰是其高明之处，它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具有严肃的政治哲学意味^②——提醒我们：在权力面前，人甚至丧失了陷入矛盾的资格，国家既已不存，何谈爱国与爱情的矛盾？这是更深的悲剧：因为面临两难困境，我们尚可以死解脱；若国家灭亡，则困境都不可得，只能屈服。亨利五世欲强吻凯瑟琳公主，搬出的理由便是“繁琐的风俗习惯（nice customs）碰见了伟大的君王就该退避三舍……我们就是规矩（manner）的创造者”。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施米特以“例外状态”对主权的界定，只不过此刻，莎士比亚以戏剧的方式，引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背景中思考这一恒久的主题。

自然，本文不可能穷尽对《亨利五世》的解读，笔者只是以此作为一种“实验”，探讨以文学透视国际政治的诸般方式。^③这番探讨或许并不使我们愉悦，因为我们无法像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那样，通过明晰的框架，对国际政治获得确切的理解。也许，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亨利五世》的终极力量恰恰在于：它指出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实质上它要求我们做出两种相悖的解释，看

① 普契尼无法使剧中的国仇家恨和爱情相妥协，拖延许久，最终留下了未完成的歌剧撒手人寰。

② 如 Quentin Skinner, “Why Laughing Mattered in the Renaissa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2, No. 3, 2001, pp. 418-447.

③ 读者如有兴趣从国际政治角度对《亨利五世》进行研究，还可参考如下论著：John Sutherland and Cedric Watts, *Henry V, War Criminal? And Other Shakespeare Puzz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History and Ideas: The Instance of Henry V”, in John Drakakis, ed., *Alternative Shakespear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The History Plays and the Roman Plays*, London: Routledge, 2003, Chapter 5; Andrew Hadfield, *Shakespeare, Spenser and the Matter of Britai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Chapter 5, 8 & 10;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Chapter XVII.

看我们是否敢于选择其一。”^①

但《亨利五世》并不是特例，莎士比亚也绝非唯一。伟大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更加注重展现世界政治的矛盾、揭示人类社会的复杂，而不是给出简单的教训、说明确定的道理。即使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人们在惊叹其对政治和历史的非凡表现之余，也时而会因托尔斯泰过多的主观评论而遗憾，因为那并不是文学的长处。

论及矛盾和模糊，我们最熟悉的当属《哈姆雷特》中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作为国际政治学者，笔者最动心的却是接下来的独白“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② 这似乎是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真实写照：或是服从权力政治的逻辑，或是构建更加理想的世界，人们总在两者之间徘徊犹疑，却难以避免地重复着自己的悲剧。

四、余 论

法国著名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曾诗意地借用柏拉图的比喻说道“思并非是要离开洞穴，并非是要以清晰剪裁的事物形象代替模糊不清的影子，以真正太阳的光芒替代摇曳不定的微焰。思是进入迷宫，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能‘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之际，使迷宫存在和显形。”^③ 这种思，大约正是我们透过文学思考国际政治的写照。

但如果说，文学让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世界政治的矛盾和复杂，却无法提供明确的解答，则我们又被迫回到原初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有何价值？社会科学如同制作地图，至少能让我们确定因果，按图索骥；文学透视如同观赏绘画，面对着一屏残山剩水，却只得空自嗟叹。

的确，文学无助于我们改变结构、影响变量、创造机制。阅读是个人化的体验，文学指向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心。毕竟，不论在权力政治的逻辑中沉浮争斗，或是在人类进步的理想中艰苦前行，国际政治的现实对我们总是外物，它是一种裹挟的力量，却无关我们——作为普通人的个体——的“存在”。既

^① Norman Rabkin, "Rabbits, Ducks, and Henry V",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28, No. 3, 1977, pp. 279-296.

^② 此处引朱生豪译文。

^③ Cornelius Castoriadis, *Les Carrefours du Labyrinthe*. Tome 1, Paris: Seuil, 1978, p. 6. “仰对着天空，卧在花丛里”一句引自里尔克诗《总是一再地……》，为冯至先生的译文。

如此，文学是否可以给我们在内心中提供暂避的空间？若政治是遮蔽，则文学或是解脱，正如叶芝在晚年一首名为《政治》的诗作中写道“关于战争和战争的警报/他们（政客和旅人）所言也许无误/但我只愿重回少年之时/将佳人在怀中揽住！”^① 不过，诗中的诸种矛盾——战争与爱情、年老与年轻、理智与情感、标题中的“政治”与内容中的“去政治”——又都让人觉得，曾经热衷政治的诗人在刻意摆脱政治，而这恰恰说明了政治的无法摆脱。须知在题记中，叶芝引用的正是托马斯·曼的语句“在我们的时代，人的命运以政治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意义。”

政治如同大地，我们无法离去。那么，我们在此逗留时，又能否以一种更加高贵的姿态，规定自己的存在？文学既能沟通心与物，既是重新理解他者与自我的场所，又可否让我们不仅张望和逃遁，也能借此再次进入政治世界？也许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存在——不再是外物的工具，更非去操纵政治，而是在文学的观照和“筑造”中获得自由和尊严，寻得自己的尺度，守护善良和纯真。如此，在国际政治“这片大地上”，即便“充满劳绩”，也可以说：

但人诗意地，栖居。^②

（责任编辑：陈志瑞）

① 由笔者自行翻译。

② 国际政治向来被认为是最“非道德”的领域，波云诡谲，充满危机和算计。但正是如此，我们尤为需要思考荷尔德林的诗句“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道“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13页）国际政治是否也能做如此解？